

热

点



M. R. Y. Z.

名人遗嘱

(下)

苏州大学出版社

题

名人遗嘱

李伶伶 编著

下 册

苏州大学出版社

名 人 遗 囑
李伶俐 编著

*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丹阳华鑫赛格电脑公司照排
宜兴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6 印张 19.5 字数 352 千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1037-195-9/Z·7 定价 20.00 元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廖 仲 恺

廖仲恺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他的父亲早年
到美国做工，因此他 1877 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的旧金山。16 岁时，他回到祖国，正值中日战争、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反帝运动均遭失败之际，苦于找
不到救国道路，便漂洋东渡去了日本。

在日本，廖仲恺认识了孙中山，并参加了孙中
山领导的同盟会，担任同盟会总部的会计。以后，他
曾几次回到祖国，积极发展革命势力，被推选为留
学生会会长。

辛亥革命爆发后，廖仲恺来到广东，任广东军
政府总参议，同时打理财政，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
的反袁斗争。当二次革命失败后，廖仲恺和孙中山
一起被迫流亡日本。

此后回国，又帮助孙中山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协
助孙中山确定三民主义，并积极宣传三民主义，自
己亲任国民党财政部副部长，广泛向各地筹集活动
经费。

1921 年，孙中山在广东就任大总统，任命廖仲
恺为广东省财政厅长兼财政部次长。

第二年，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再次被迫流亡，而廖仲恺却被扣押，关押在石井兵工厂。他以为陈炯明一定会加害于他，便在囚禁地写了两封遗书。

第一封是给妻子何香凝的：

留诀内子

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
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

生无足羨死奚悲，宇宙循环活杀机；
四十五年尘劫苦，好从解脱悟前非。

第二封是给女儿廖梦醒、儿子廖承志的：

诀醒女承儿

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
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
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
阿爹苦乐与前同，只欠从前一躯壳。
躯壳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委沟壑。
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
尚有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

但他并未遇害，二个月后就被释放。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先后担任中央

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黄埔军官学校党代表、广东省省长和财政部长等职。

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更努力地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忌恨。1925年8月20日，被国民党右派暗杀。

列比耶尔

安德列·列比耶尔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曾担任法国义勇军和游击队联军的指挥官。1941年12月被捕，一年后被枪杀。

他在临刑前曾给妻子写了一份遗书：

我心爱的人：

写信给你——和你再谈一次，这横竖总是一样，因为这几行字你只是在几天以后才会收到，我简直有权称这几行字为遗书了。我有些根据为你担心，因为一个不久前被捕的、我得以和他互通信息的同志告诉我说，你的许多同事也都被捕了……有所爱的人总是不安的，而我却是非常爱你的……

你知道，迫害我的刽子手们不仅在肉体上折磨我，而且在肉体折磨之后，更从4月23日到7月16日多次告诉我，说你被捕了。这是极其痛苦的事，尤其是当我没有收到你寄来的东西的时候，我无法怀

疑这是假话。我希望你一点也不知道我是正处在怎样的情况当中，——要不然，你会比我更加痛苦的，我的宝贝。

同志们将会告诉你，因为我企图逃跑，因为在我毛巾的夹缝中发现了缝在里面的写给你的信件，我都经受了些什么折磨。我顽强地支持住了，并且非常高兴，因为总算碰了碰运气，因为在我被杀死之前，总算试了试从这儿逃跑——从前曾有人这样教导过我们。我的计划破产了，但是我又有了新的计划，要是我还能活几个礼拜，也许，我会逃出去的……

我相信，迫害我的刽子手们的活命的日子是屈指可数了。我知道，今天应当举行全国阵线的示威游行。要是接着这次游行再来一些其他活动，使那些“袖手旁观的人们”也站在更符合于人民利益的立场，那该是多么好啊！

我十分清楚，斗争的新阶段正在开始，而斗争将会采取使许多人惊奇的形式，这需要英勇果敢、坚强有力的人！可是，只要一想到，我得倒下，我得安息，就……

你看，我虽然带着镣铐，字还是写得很工整吧！虽然我被囚禁，但却并没完全忘记书法（我已经5个月没有读书，没有纸张，而且我是手上铐，脚上镣）。

你的爱，我们之间的爱情，我们的理想支持了并且正在支持着我。衷心地希望，在你火热的生活中也有这个支柱……

爱我的儿子，爱艾丽莎，爱我们一切亲近的人，爱路易和马尔格里特吧，在他们身上就有我的一部分。向我的一切朋友致意。让我最后一次的亲吻——我最后一次的温柔的亲吻——炙干你的眼泪吧。

别了，我亲爱的！

我们的理想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前进，永远前进，光明的日子临近了！

列 宁

革命导师列宁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身体状况非常差。起初医生对列宁时常头痛无法确诊，总认为那可能是他身体中没有取出来的子弹引起的铅中毒。于是，医生们对列宁进行了手术，取出了其中的一颗子弹，另一颗因为陷得太深而没有动它。但是，手术之后疼痛并没有减轻。几个月后，列宁开始呕吐，腹痛，右臂出现麻木，口齿也越来越不清楚，终于确定是患了脑溢血。

患病后的列宁始终没有停止工作，以至病情继续恶化。

1922年12月上旬，列宁的右半身瘫痪，他自知时日已不多，决定尽快就国家合作化、文化建设、民族和国家机构、党的建设等问题留下自己的建议。

23日，列宁在医生的同意下，口授了6份文件，其中一份是《给代表大会的信》。信的内容如下：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问题。

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指出要将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以增加中央委员人数的方法来对现行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以

加强党的巩固性。这说明列宁那时已觉察出党内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而这种不稳定因素乃是由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关系的对立。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当时都是政治局委员。于是，关于这一点，列宁又作了补充：

12月24日。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可以不谈。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

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

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0月25日。

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望他的。

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在1919年，斯大林担任政治局委员、民族人民委员，后又在季诺维也夫的提议下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党内曾有些人认为将太多的职务集于斯大林一身不大合适，但列宁却认为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能胜任这些工作的人了。3年后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从此，政治局里形成了由斯大林和另外两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3人联合起来的“联盟”，共同反对托

洛茨基。对立与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一段时期的观察，列宁发现了斯大林身上的弱点，感到3年前有些人的看法是对的，他开始为斯大林身上集中有太多的权力而担心，也为政治局内部的分裂因素感到不安。所以，他想减少斯大林的职务，将其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撤下来。

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对12月24日的信作了再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除了对斯大林等6位政治局委员作了个人评定外，还在12月26日就当时“糟透了的”机关提出了一些改善措施：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 50 人甚至 100 人，依我看，可以达到双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机关。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抱着讥讽态度或怀着恶意指出我们机关的缺点的“批评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现今革命的条件。在 5 年的时间内要完成机关应有的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所处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 5 年内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类型，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

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查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5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

我认为，在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时，还应当、也许主要应当检查并改善我们的毫不中用的机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利用高度熟练的专家，而配备这些专家则应该是工农检查院的任务。

如何使这些知识丰富的做检查工作的